

“负面情绪”无错，“恶意挑动”有过

熊苗

当情绪泛滥,理性也就难有生存空间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当下信息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相关部门介入的深层动因。

海音公语

“情绪”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如此显著的关键词。流量时代,戳中舆论“情绪”就意味着点击流量穴位,“情绪”成为流量的底层逻辑。可以说,今天的网络生态已经和“情绪”高度绑定。

为整治恶意挑动对立、宣扬暴力戾气等负面情绪问题,营造更加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

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情绪,挑起网络暴力戾气,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专项行动剑指这4类突出问题,传递出清晰信号:煽动对立、贩卖焦虑、宣扬暴力等网络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单就情绪而言,正面、负面本身并无高下之分。就像愤怒,驱动人们追求正义;恐惧和焦虑,驱动人们预警和识别危险;悲

伤,让人们学会面对失去……但如果这些情绪被无限放大,个体持续被裹挟其中,危害的是个体的身心健康和情感协调,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生态和发展趋向,有害而无一利。从这个角度来说,负面情绪本身没错,是需要疏导的情绪,错在在各种私利和目的“恶意挑动”,把整个网络生态弄得乌烟瘴气。

就像婚恋焦虑和性别对立。焦虑必定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真问题,但当被恶意挑动形成极端对立的情绪后,就失去了思辨对话的空间,只剩下撕扯和谩骂。这种恶意挑动也不难发现,想想网络上的水火不容,再看看生活中的两性共处,网络对极端情绪的放大效应就不言自明了。

当情绪泛滥,理性也就难有生存空间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当下信息市

场存在“市场失灵”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相关部门介入的深层动因。

根据部署,本次专项行动将聚焦社交、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全面排查话题、榜单、推荐、弹幕、评论等重点环节。其中的关键落点就在“平台”上。追逐流量是平台的生存和逐利本能,而被挑动的情绪是滚滚流量的天然原料。尽管平台的算法和流量逻辑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外部性”,大家都在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中难以顺畅呼吸,但如果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干预,平台就不会有动力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平台的成本看似只有其自身的投入,实则还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公众注意力资源的错配,理性的丧失,社会的撕裂,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等等,哪一项都是隐性的,哪一项带来的后果都是难以预估的。要求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对应的正

是这部分社会成本。

9月11日以来,小红书、快手、微博、今日头条等几大网络平台因破坏网络生态被约谈,就是清晰的治理信号。如何从机制上推动建设更合理的平台算法和推荐逻辑,让平台不再释放“负外部性”,考验着一系列整治行动的成果。

当然,收割流量的不仅是网站平台,还有各类账号和MCN机构。在敦促网站平台改变流量“指挥棒”的同时,也要对各类吃恶意挑动情绪馒头的账号和MCN机构严厉打击。如果任由一个个这样的账号大行其道,只会“劣币驱逐良币”,引发跟风效仿,不断拉低网络社会的底线。

对于网络世界,人们经常会想到“乌合之众”,在人群中,智商和理性都会降低;但还有一句老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近年来,在网络走向极端对立化的同时,每一次网络热点的背后,也不乏网络自动纠偏和净化的身影。这同样是网络文明进步的希望和力量。最终决定互联网走向的,仍然是每一个成熟的网友,是正在上网的你我。

让「票根经济」超越纸面联动

盖颖帆

9月19日起,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于济南连续举办三场。演唱会期间,观众凭演唱会门票可享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等折扣优惠,让去年兴起的“票根经济”再度进入人们视线。

“票根经济”本质是联动消费,指的是消费者凭借车票、门票、消费小票等,到联盟商户兑换专属折扣,享受优惠权益。让“一次消费”延伸为“多次体验”,让“单一场景”联起“多元生态”,既展现出政府提振消费的决心,也考验着城市如何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留量”。其中关键,在于“票根经济”能否真正从纸面联动走向深度融合,让消费场景持久走发吸引力。

一段时间以来,“票根经济”热度上升,但也面临不少困境。比如,围绕单一活动开展的合作临时性较强,政府推动指导合作的商家数量、质量均有限;游客无法及时获取优惠信息,导致优惠点与主流行程规划错位……这些现实挑战,都使得联动效果大打折扣。

以今年4月济南融创国际体育中心举办的穿越火线职业联赛总决赛为例,同程App的官方售票界面并未显示联动合作的景区、商家,只有当观众拿到纪念票根后,才会发现门票背面印着合作点。而大部分游客通常在出行前就安排好了游玩计划,要想让他们为了合作景区更改行程,吸引力着实有限。

“票根”吸引力有限,究其本因,还是与主体活动开展联动合作商家的数量有限、质量一般化、优惠联动吸引力不足有关,这才让联动停留在“纸面”,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该如何破局?与部分商家签订合作协议并常态化推广,就是一种不错的解法。以烟台芝罘区东山街道今年7月成立的“票根经济联盟”为例,首批汇聚景区、餐饮住宿、零售三大领域14家企业作为成员,实现了消费场景的深度融合和商家资源的协同共享,也有效缩短了消费半径。

不过,联盟的建立仅是“物理组合”,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化学融合”。这需要建立基于消费者口碑和数据的动态评价与退出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确保联盟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同时,文旅部门和相关经营主体还要做好市场调研,理解消费者的核心需求。并以市场反馈为依据,围绕核心IP深度挖掘,充分利用起周边资源,设计主题鲜明的旅游线路、消费套餐,将分散的合作商户串珠成链,打造成“沉浸式体验”的一部分。

还需注意的是,随着电子票务逐渐成为主流,传统的票根模式面临挑战,这对营销触达的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关部门和相关经营主体必须打好“提前量”,在购票环节就精准推送完整的优惠信息,变“被动发现”为“主动引导”。

归根结底,“票根经济”的潜力释放,不仅依赖一时的政策热情,更取决于长期的市场耐心与精细化的运营能力。持续丰富文化资源、消费场景供给,方能将各类演出赛事的“爆发式流量”,转化为激活本地消费市场的“可持续留量”。

让每一次基于票根的联动,都成为提升城市口碑、赢得人心的契机,那些小小的票根,方能超越纸面联动,成为激活消费的“金钥匙”。

凡人微光点亮城市精神

李岳岳

一份善意能走多远?烟台街头的一盆盆绿植中,藏着温暖的答案。

为帮助朋友患白血病的妻子,烟台外卖小哥王旭光自掏腰包,发起了一场“爱心绿植义卖”活动。目前,已经有近70家商铺加入进来,这些商铺主动提供场地,在门口摆放绿植和宣传板,进一步扩大了爱心的传播范围。

从一个人的善意,到一群人的接力,照见的是城市文明的底色。困难面前,有人率先站出来施以援手,爱心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唤醒更多人内心的善意。随着一份份善意散发传递,就能形成一种大气候,汇聚成向上向善的强大正能量。

这些正能量,正是城市的精气神所在。一座城市的文明和温度,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和繁华街道上,更存在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善举之中。从烟台的爱心绿植,到淄博的爱心冰柜,好人的集聚是城市文明的厚积薄发。其中的每一份平凡善举,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人们可以从一次次善举中触摸城市的温度,感受向善的力量,从而更愿意主动去成为那束“光”,用实际行动照亮他人,为城市建设增添光亮。

越是微光,越用力呵护。平凡善举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们源于人们内心最朴素、本真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超越身份、年龄等界限,唤醒城市中的集体善意,形成更稳固、更有韧性的社会治理网络。我们理应呵护这些善意,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的治理资源。当“好人好报、德者有得”成为共识,平凡善举得到应有的尊崇,才能激发更多人愿为善、敢为善的内生动力。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美好城市,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民间自发互助的故事,彰显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当前,不少地方探索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如聊城的“有事来聊”、菏泽东明的“村民议事厅”、济宁邹城的“网格有约”等等。群众表达诉求、协商共治有了更加多元的平台,政府的角色,也渐渐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和“赋能者”,为基层善治注入持续动力。

事实证明,让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当主角,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就能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提升城市治理的效能,焕发城市发展的朝气,让生活其间的人们拥有更多幸福、获得感和归属感。



沉下去观察,立起来评说
官方微信: 携舆工作室
投稿邮箱: dzrbplb2016@163.com

“过紧日子”系列漫评①

对铺张浪费狠狠“切一刀”

【事件】

今年5月,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颁布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

【点评】

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过紧日子”,而个别党政机关在公务接待中仍然存在讲排场、比规格、摆阔气等现象,不仅耗尽了公共资源,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不是“一刀切”的全面削减,而是要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精准“切一刀”。这一刀,首先就要指向“车轮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等铺张浪费现象。

刹铺张浪费歪风邪气,一方面,要紧盯公务接待活动、公务用车、会议活动等重点领域,严查超标、虚列开支等行为。同时,强化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文/辛语 图/徐进)



体育赛场,人民主场

赵晓昕

在持续拓展体育精神的内涵之外,全民体育也成为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新引擎。骑行、徒步、马拉松、城市足球联赛……群众成为体育赛场的主角后,不仅会身体力行地去运动,也会真金白银地去消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山东共举办500人以上赛事739场,带来直接经济效益46亿元,间接经济效益达113亿元,成为体育总局点赞的赛事经济标杆。

过去,竞技体育是体育赛事的大头。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彰显着一个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高度,也带动了赛事版权、门票收入、商业赞助等全产业链发展,得到资源与注意力的倾斜在情理之中。而如今,群众性体育赛事也展现了自己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为城市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拿齐鲁超赛来讲,在淄博的揭幕战吸引了2.5万名球迷现场观战。赛事期间,淄博酒店入住率激增,核心区域“一房难求”,赛后

集中的聚餐和消费需求热度也明显提高。这种盛况,也在各个比赛城市同步发生,多地创下基层足球赛事的观赛新纪录。伴随各地准备好的文旅“大礼包”,赛场外球迷们热情不减,为城市经济注入新动力,充分展现了群众体育赛事带动经济增量的“乘数效应”。

体育消费作为重要的改善型消费,在落实促消费、扩内需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做强赛事经济,将引来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这两个赛场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山东从体育大省向体育强省的迈进至关重要。

群众赛事的生命力,根植于地域特色与社区认同,各地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群众基础,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赛事项目。近些年,山东创新打造沿黄、沿海、沿大运河、沿齐长城“四沿”体育赛事体系,推出“九九黄河”等特色体育赛事,有效避免了盲目模仿与

同质化竞争,成功地激活本土文化基因,从而形成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要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真正“比翼齐飞”,还要破解资源分配难题。职业赛事凭借其成熟产业链,长期占据着场馆、资金、媒体关注的优先权。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做好服务员,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为赛事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还要优化审批流程,降低办赛成本。

同时,要推动职业赛事与群众性赛事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职业赛事可以主动“下沉”,从民间体育中获取养分,提升大众参与感,甚至挖掘优秀的体育人才。据悉,此次齐鲁超赛的优胜队将获得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推荐参赛资格,有了步入职业足球体系的敲门砖。群众赛事则可从竞技体育中汲取灵感,把一些小众、专业的体育项目向全民化转变,为体育消费打开更多市场空间和消费潜能。

优绩主义下的家校合作如何纠偏

迟鸥

近年来,教育惩戒相关新闻时常引发争议,家校冲突不时登上热搜。

除去极端个案,作为以育人为共同目标的合作主体,家校间本不该如此。但当下的现实是,教育相关热点事件通常以各方立场不变、情绪暂消的方式隐退,然后在下一次类似事件发生时情绪再次复燃。所以,针对常见的家校冲突事件,在追问事件真相之外,不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惩戒怎么就失当变成了体罚?二是家校合作有没有失焦?

对于教育惩戒,社会本有比较一致的认知基础,就是学校教育过程中针对违纪的未成年人进行纠错。适当惩戒,是教育应有之义;支持惩戒的大众,同时反对体罚,这也并不矛盾。而在惩戒失当变成体罚的诸多事件中,大家往往归咎于对学生施加体罚的教师个体,却忽略了惩戒失当变成体罚背后,不只是教师德行有亏和对惩戒尺度把握失当,还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因素:体罚背后往往有延续下来的施教传统。

因为社会及历史原因,硬件实现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教学理念的现代化相对滞后,

升学主导的优绩主义长期存在于基础教育学校。在一些地区及部分学校中,教育方式更接近传统的教育观念。

从社会层面,在一些城乡街道宣传栏里,“理儿奉母”等传统“二十四孝”的传统美德宣传,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普法宣传并存。在学校层面,往往对《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规定进行扩大阐释,对学生管理加码,比如对学生发型的超规格限定,对学生进行过度的感恩教育等。一些学校的施教理念往往取决于教育者自觉正当,而不怎么考虑现代社会背景下受教育者的接受程度。换句话说,一些学校在用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的理念教育人工智能时代面向未来的孩子。

而在当下依然存在的以升学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优绩主义风潮下,家长与学校达成了应试教育需要严管的默契。但这种严管,早已剔除了传统教育里再正常不过的“体罚”许可。面对身体处于发育期、思维活跃的少年儿童,若不能以高水平的教育激发其学习内驱力,简单粗暴的严管就会成为日常。而这种严管更容易成为一个学校的集体

共识,进而固化为一种学校文化,且应试成绩越好,学校文化的固化程度就越高。在优绩主义下,家校合作便很容易表现为以成绩与升学为中心,而非现代教育理念中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此时,家校合作已然偏离了方向。

表面达成一致的家校合作,实则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家长要求成绩,但不等于学校为了成绩而采取的学生管理措施都有了合理性,实际不被接受的侵权,在关键时刻才暴露出来。不只体罚之类的事件,以往手机管理等,也常引发家校冲突。值得深思的是,在冲突事件发生后,非冲突当务方的家长群体为老师辩护的发声,也常常围绕其所带班级成绩有多好。而受这种教育文化影响,在具体实施教育的教师那里,就很难把握惩戒尺度,在冲突发生后,也往往觉得委屈,难以认识到问题所在。

没有惩戒基础,又有目标共识的家校冲突,实则是优绩主义下各方“努力”所导致的扭曲和冲突。在教育部去年印发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十二条负面清单”里,“严禁教师歧视弱势群体学生,对学生实施体罚、

变相体罚、辱骂殴打、性骚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与“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下达升学指标,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是并列的条文。把这两条联系起来理解并践行,冲突发生的概率或许就能减少了。

每一个冲突事件背后的教育分歧,都是教育文化冲突的一次体现,也应该成为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方式的一次提醒。未成年人日常在学校所犯的错误多属于事实判断范畴,要十分谨慎地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惩戒要慎用。

同样,家校双方都应该致力于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宽松的氛围。诚然,教育并非世外桃源,本身也是功利化氛围的一部分,但家校仍然要尽己所能给孩子留下喘息空间。这中间,也包括家校之间要有更宽松的关系,否则越拉越紧,最后仍然会形成氛围笼罩在所有孩子身上。

面对未成年人的家校双方来说,教育所含的爱是接受者感受到的体验。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份爱,时常记起对方的体验,或是当下教育困局的解药。